

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历史演进与逻辑内蕴

孙秀民, 高维峰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党的基本路线与主要实践的思维指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奋斗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并且善于进行战略思维,进而展现为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人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在党和国家发展各个关键节点起到至关重要的思维指导作用。习近平战略思维是其进入新时代的最新成果,展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创新与时代旋律的统一性,和面对新的挑战时勇于自我革命、勇于革新探索的战略气魄和战略定力。总结和梳理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历史演进与逻辑内蕴,对当前党的自身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历史演进;逻辑内蕴

中图分类号: A8;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7X(2021)01-0001-09

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奋斗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并且善于进行战略思维的党”^[1]。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将理论思维创新与实践奋斗相结合的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了不断的思维创新、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从而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辉煌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战略思维经验,“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理论和方法”^[2]。这对新时代应对新的执政挑战与风险,“不断增强战略思维的自觉性、掌握战略思维理论和方法、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增长战略智慧”^[2],以之推进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思维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主要内涵

1. 战略思维的基本内涵

战略思维是由“战略”这一概念而衍化生成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团体在与外部力量斗争中所凝聚而成的智慧经验总结。在不同的领域,战略思维有着不同的概念和内涵,到21世纪初逐渐成为对各领域领导者素质的核心要求。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把战略思维形容为“对全局的准确性判

断”^[3];与他同时代的约米尼认为:“凡涉及整个战争区的问题,均属战略范畴。”^[4]。从国家治理与政党建设的角度来看,对战略思维的概念理解和把握较为权威的是毛泽东,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思维就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5]他强调战略思维的核心意义在于基于整体的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好战略活动中各元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以期更好地实现一种整体和长远的战略效果,即全局的效果。总之,战略思维强调的是领导者为达到某种战略性目标而进行全局性、整体性和战略性决策所遵循的思维方法。

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6]回顾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作为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运用战略思维指导于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并以此制定实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与重要的方针政策,在各阶段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2. 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主要内涵

创造性地运用战略思维指导理论与实践是中共

收稿日期:2019-09-20; 修回日期:2020-08-25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研究”(20ZDA022);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英雄情怀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意蕴”(2020-ZZJH-275)

作者简介: 孙秀民(1963-),男,辽宁开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党的政治建设研究;高维峰(1977-),男,河南开封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新媒体新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E-mail: morisony@163.com。

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持续成功的思维保障。中国共产党人从战略高度和整体全局视野上不断探索党的自身建设经验、国家发展方向、民族复兴的道路,在不断的经验与教训积累下以战略思维辩证解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重大战略问题^{[2]1}。每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转折或关键节点,党的主要领导者(们)总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全局性、整体性的战略高度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大政方针和战略计划,把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向胜利的方向推进。因此,对党的战略思维做全面系统的回顾与梳理,并总结和提炼出独具中国革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理念和战略方法,既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也有非常强的实践指导价值。

中国共产党人所秉持的战略思维,并不是简单的全局性思维或目标性思维,而是有着非常深刻和富于哲学意蕴的思维内涵。恩格斯曾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7]873} 战略思维同样属于历史的阶段性产物,不仅生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反映出了一种大历史观下的整体性战略思维。从党的建设角度讲,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其实正是为科学地适应时代发展和自身建设而不断进行的自我革命思维之体现。正如 2019 年 7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中所讲,“要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就是要“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8]1031} 的初心和使命,“以强烈的自我革命意识”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强化“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实现“既有破又有立,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8]1035}。

二、新中国 70 年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历史演进与发展

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持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事业稳步推进,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战略思维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中既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又在客观上见证着所取得的伟大而辉煌的成就。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是以该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所展现的,因此,本文关注于新中国 70 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以此观照党的战略思维演进与发展。

从总体上看,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者面对不同的任务,其战略思维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点和内涵。毛泽东面对异常复杂的革命战争形势,其战略思维表现出强烈的战略纵深穿透意义和世界大格局的战略眼光,以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斗争实践高度融合的实践唯物主义战略思维和领导艺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领导者,紧扣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一以贯之地坚持改革开放下的发展战略思维,确保党的事业稳定推进和国家民族复兴的强基固本。而步入新时代,习近平在前瞻性视野和大历史观格局下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研判中,明确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其战略思维创新与时代旋律的高度统一,体现出勇于自我革命、勇于革新探索的战略气魄和战略定力。

1. 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具有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经纶天下的战略思维”^{[2]157},这代表了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特点,因此,对其战略思维的考察必须延展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早期的中国革命领导者是在异常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在血与火的锤炼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其战略思维带有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底色,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因此,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实践中逐步产生、发展和形成起来的”^{[9]5}。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实践中得以不断检验和升华,另一方面又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领导方法、领导艺术系统化、理论化,以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原则提出了具有战略纵深穿透意义和世界大格局战略眼光的战略思维,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厚底蕴,渗透着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的系统化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而伟大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集中围绕着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初步建设两个方面,特别是在其早期军事思想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在中国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和革命斗争中都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这促使毛泽东从理论、实践、历史等全方位对党的政策策略、军事战略和思想路线等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反思和系统总结,并在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集中体现出其战略思维。

首先是对中国革命战争及其规律的认识。回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5]171}这明确表达了他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全局、从经验到规律的战略思维特点^{[2]43}。他认为,对于中国革命特别是战争,要从其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着重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一切战争都有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不能正确认识这些,不能从规律中总结和提炼经验,找到解决办法,是无法正确指导战争和革命的,因为中国革命其实主要是以战争为手段实现的。以此为指导,他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4个主要特点,并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5]191}。他同时指出,要从全局的战略高度着眼去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5]175}这就是说,要以战争规律及其变化为基础,从全局角度抓战略重点。这种战略意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指导,并进而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的谋划提供了借鉴。

其次是对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战略思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全局性的战略眼光高度重视政策与策略的重要性,认为其是党的生命之所在;二是坚持以整体性战略的视野注重唯物辩证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在《论政策》《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政策和策略的科学性,才能指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这就要求党的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考虑到当时当地群众的物质利益、意见要求和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等。他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5]152}在论及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时,他强调要从战略的高度对待与同盟者的关系,在

照顾其利益的同时给以其思想教育,使之逐渐转化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这样才能在战略上实现对同盟者的领导,以结成一个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政治联盟。而在论及领导战略时,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常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中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指出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0]801}。他还以“解剖麻雀法”为喻生动地形容了对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典型试点、经验总结、再进行面上的逐步推广的方法,即“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10]900}。这就是说,把对事物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规律性经验的总结的战略思维,是毛泽东解决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党的领导的重要工作方法。

最后是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初步探索与经验积累。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以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并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以苏为戒’、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思想”^[1],据此提出党的基本路线,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好各种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等重要战略方针。在全局上确保了当时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因此,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曾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11]后来,由于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特别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国民经济出现了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困难。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做好的事情必须有3条,即“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12]234}。他说,要根据详细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以此来制定方针、政策,否则制定的政策就不可靠,工作就没有基础。“过去搞革命战争,没有一次是情况不清楚、条件不成熟而打了胜仗的”^{[12]235}。现阶段(指1961年前后)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困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调查研究,没有实际的支持。所以,他在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还从战略高度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注重工作方法和发展规律的准确把

握,特别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13]1442}。

从整体上讲,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整个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展现了创造性的战略思维和非凡的领导智慧,克服了内外多重阻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仅使新中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工业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战略思维的重要作用。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领导人的战略思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领导人的战略思维集中体现为对毛泽东战略思维的继承与发扬,即着重于紧扣时代主题思考中国发展问题,并以全局性视野谋划制定党的发展战略。其中,邓小平的战略思维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转折关头,通过首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以统一全党意志,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党的事业,并以极富历史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在中国道路选择的关键时期从战略上系统地回答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探索,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战略思维的突出范例。

历史的转折固然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仍然需要杰出人物有责任担当地去推动实现。在经历了十年的曲折与磨难后,党内一度处于思想混乱、各项工作半停滞的局面,此时的邓小平以战略家的韬略通过开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导全党、全国人民深入进行思想的拨乱反正。他强调不能片面领会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4]43},从全局和整体的角度启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战略思维,为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小平首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富有鲜明时代色彩的主题作了全面系统论证,从战略高度消解了对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理解,在客观上结束了姓“社”姓“资”之争,进而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指导全党确立起“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基本路线和相应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政策等。他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强调必须坚持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4]143},这些战略思想振聋发聩、高屋建瓴,“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国内外严峻的政治形势,邓小平又以坚定的政治定力和历史性战略眼光发表了南方谈话,廓清了一段时间内人们思想的混乱,重新强调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

面对世纪之交以来的世界形势变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江泽民、胡锦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继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战略思维,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在这期间,江泽民从战略高度对国家历史方位和党的根本任务作出科学研判,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更好地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党的各项战略,以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增强党的群众基础、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确保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胡锦涛则通过深刻总结时代的特征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科学继承和发扬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从战略高度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而发展、怎样去发展、靠谁来发展等一系列党和国家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并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构想,在战略上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布局。

由上可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的辩证化战略思维基础上,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审时度势,围绕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战略上确定和长期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历史逻辑的角度以改革开放作为国家长期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形成了新的历史时期以发展为中心的宏观战略思维。如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时曾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5]105}这为我们党观察和解决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问题提供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战略视角。江泽

民在论及党的中心任务时说:“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会不断深化,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各方面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也必然会有所调整。”胡锦涛在强调科学发展时说:“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16]把发展提升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所秉持的战略思维核心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现实矛盾,解决关键问题,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始终能够不偏离方向、取得一项项胜利的根本保证。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的战略思维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更为艰巨的任务与挑战,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意味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内涵式调整,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具创新、前瞻性的战略思维的引领。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这一重大战略研判正是基于对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和古今中外国家盛衰、政党兴替经验教训所作出的。以此为基础,习近平以高远的智慧和深邃的眼光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5种思维理念,特别是以战略思维为核心对党的事业和民族复兴大业进行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科学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事业科学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坚实的思想保障。

习近平战略思维的主题是系统研究和解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强调:“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6]60}针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世界局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变的国内形势、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党的自我革命态势,他向全党强调“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17],并从战略高度提出了要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略,确保了党的事业在战略目标和战略方案上的一致、战略全局与战略重点上的一致、战略定力和战略举措上的一致,实现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战略思维不仅注重从党的建设总体上作出谋划,而且在党员干部战略思维能力的涵养和提升方面也作了规定性的指导。他指出:“抓住重点带动面上

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6]61}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指出,面对“执政考验”等四大考验的挑战,广大党员干部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提高“四种意识”,主动增强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18]。领导干部有了这种能力,就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以战略意识涵养“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的能力,从而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19]207}。这样,我们党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保持强大战略定力,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19]172}。

习近平战略思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维内核,展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创新与时代旋律的一致性,与时代背景下党的建设理念相契合,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新的挑战时勇于自我革命、勇于革新探索的战略气魄和战略定力。这种内在的契合有3个方面的统一:

一是其战略思维创新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统一。思维创新能指导党在执政中更好地总结实践经验、形成观念突破、树立新的执政理念,促进党的执政能力提升^[20]。习近平的战略思维意识非常明确,对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十分重视,多次强调领导干部都要不断提升总揽全局、统筹兼顾的战略思维能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科学执政水平。早在担任地方党政负责人时,习近平就非常重视领导干部战略思维的提升:“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要“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以世界眼光去认识政治形势”,“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以“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21]。这是从地方领导干部的视角思考战略思维能力的重要作用。后来他担任党的核心领导人后,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又强调“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6]9},并倡导领导干部都要以邓小平同志为榜样,学习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谋略,以及“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这样才能确保“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

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6]10}。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并善于进行战略思维的优良传统的总结,更是对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升战略思维能力的一种期许,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思维指导。

二是其战略思维创新与党的自我革命意志的统一。2018年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勇于自我革命贯穿于党的发展过程始终,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一论断鲜明表达了强烈的战略危机意识,从党的长期发展战略上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的内在关联,明确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2019年8月1日,习近平发表《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再次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是显著的”,但党自身绝不能自满止步,全党上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党的自我革命任重道远”^[8]。并从全局与重点的辩证关系分析方面指出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必然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即: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不断提高自我革命实效;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把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由此可见,在党的自我革命论述中,习近平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既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全局性、整体性、历史性,又指出了抓重点、抓实效、抓创新的发展思维,彰显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正是其战略思维特点的集中体现。

三是其战略思维创新与中国梦目标实现的统一。这是习近平战略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思维指导行动,实践反馈于理论创新。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向上,习近平强调,在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方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要“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6]61-62}。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2]9},这

一矛盾变化的判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中国梦作为党现时的核心宗旨,一心一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下去,毫不动摇。他要求全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矢志不移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是习近平从卓越战略家的高度对我国所处历史方位进行科学研判后得出的战略性论断,充分展现了他的战略思维的全局意识、宏观意识和发展意识。

三、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逻辑内蕴

中国共产党人在奋斗历程中所凝结而成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智慧,是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取得的,在深层意义上更是对马克思主义200多年发展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得来的,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呕心沥血的思维智慧结晶。总结梳理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历史演进,不只是为了洞悉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思维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更要为今后党的自身建设、党和国家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因此,要深入了解分析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逻辑内涵。

1. 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阶段实践的思想先导,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战略思维的根本要求包括战略的全局谋划、战略内容的主次分明、利益与立场的统筹、过程的照应与兼顾、重大问题的旗帜鲜明等,其本质在于主体通过对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深刻认知,从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矛盾性等方面对规律进行分析和把握,以期提出具有适应性的科学战略策略和决策,指导主体的实践活动。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其战略思维不仅仅是哲学逻辑思维的集中体现,更要“能够战略性地认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23],能够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科学制定和决策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以之决定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产生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智慧,是在实践上体现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党的本质规定、内涵要求与时代特征相统一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在这方面,毛泽东可以称为党历史上的战略思维大师,他在军事、政治、领导艺术等方面把战略思维

巧妙地融入到具体的工作中去,大道至简,举重若轻,形成了鲜明的战略思维风格,深厚的哲学底蕴使得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充满了思辨的智慧。例如,毛泽东把矛盾分析的思维运用于领导工作中,提出了“统筹兼顾,重点把握”的领导方法,并以“弹钢琴”为喻:“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相应的,“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13]1442},要做到党内、党外、军队、地方等各项工作都要顾及到,以形成一种全局联动的工作局面。这就是毛泽东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既统筹兼顾、又突出重点的领导战略思维的鲜活体现。同样,邓小平也充分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融入战略思维中去,从社会矛盾原理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为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制定确立了时代主题和社会发展基础。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深邃观察力、敏锐判断力和强大坚韧的战略定力,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落脚于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现实战略目标。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6]21}其含义表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又在时代特点下赋予其独特的中国样态,是一百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有机融合。他战略性地提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统筹国内外大局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规划,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的方法做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科学论断,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切路线、思想的形成和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实现,都是由其宏观的战略思维所决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矛盾分析辩证法、联系与发展观点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时代继承与发扬。

2. 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主要通过理论的发展、路线与政策的制定体现,是党的基本路线与主要实践的思维指导,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党和国家民族命运

从根本上讲,战略思维强调要重视并善于从事物本质出发,把战略发展中的诸多具体方面上升到原则问题去把握;同时要重视并善于把当前的具体问题放到大的过程中去思考,以远见卓识的战略意识加强前瞻性研究。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表

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战略思维把握全局、把握历史发展,用于指导党的基本路线和主要实践,特别是在几次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战略思维均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党的永葆生机和国家民族的命运。

具体来说,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促使其能够在中国革命遭遇最危急的时刻以战略家的眼光引领中国革命向广阔的农村发展,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革命最坚实的支撑和最有力的革命力量发动起来,在关键时刻为革命斗争续力。随后毛泽东又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全局视野看到了当时中国革命局势的强弱分布,完成了遵义会议上战争路线的正确转向,挽救了中国革命,也挽救了处于转折中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审度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后,从战略上做出了逐渐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关键决策,为之后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最初的国力基础和经济基础。进入“文革”后期,邓小平作为新一代战略政治家,在党又一次面对危机的时候果断做出战略决策,一方面联合其他老革命家迅速稳定了党内政治形势,另一方面以敏锐的战略眼光观察到当时党内国内的思想混乱状况,从而巧妙地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启了思想拨乱反正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实施至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15]375}“抓住时机,发展自己”^{[15]374}。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也均体现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定了这一基本路线的贯彻实施,把改革开放事业稳步推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改革、文化与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路线保障、组织领导保障和物质基础保障。

习近平作为新时代党的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再次以战略家的视野和政治家的韬略,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进行了科学的研判,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民族事业发展作出了战略规划,一以贯之地坚持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认知,作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科学论断,确定了国家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中国梦的伟大战略目标。在新时代来临之际,习近平明确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这一战略决策是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发展极不稳定、我国经济面临深刻转型、经济新常态处于形成过程中作出的。他同时还提出,新时期加强党自身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的战略部署,在党的长期执政条件下,

面对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挑战,面对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必须以长远的战略思维狠抓全面从严治党,促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

3. 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是形成各个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思维基础

思维是思想形成和理论发展的先导,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是党各个历史时期指导思想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思维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首先聚焦于各时期世界格局形势下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战略安排,以此寻找在这一战略任务中的关键性领导作用,进而形成较为具体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决策,以引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能以此为指引发挥各自作用并聚合形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所以,从思维指导实践和从实践提炼理论总结这一螺旋式上升规律表明,战略思维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指导思想的形成发展中起着关键性源起作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指导思想,都是经过血与火的锤炼、理论与实践的反复验证得来的,是党的各项事业探索中战略思维决策的实践积累所得。

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例,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主题是系统研究和回答“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革命”,以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回答。他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以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总结为基础,集中了全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指导思想^{[2]37}。他的全局性的战略视野、整体性的战略胸怀、矛盾分析的辩证战略思维方式、统筹兼顾的战略关系调整方法,在整个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在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政策》《论十大关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思维基础。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中,也处处能体现出战略思维的关键性指导作用。习近平战略思维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善于从世界局势和历史发展纵横两个维度全面思考战略问题并指导于治国理政的具体决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建立在这一战略思维基础上。习近平再三告诫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有助于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的纷繁复

杂变化,有助于领导干部在关键时刻作出科学正确的战略决策,坚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从而使保持战略定力能够奠定在理性自觉基础之上。而在研判思想意识形态变化、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性、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等方面,他又强调要以战略家的高度提升战略决策能力,要能够把这种能力转化到决策的原则性、整体性、预判性上,使提升战略思维能力能够在价值、空间、时间和实践 4 个维度上全面展开。因此,战略思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育形成全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源起性作用。

四、结 语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对新时代党的基本路线、中心任务和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均能起到思维指导和智慧启示作用。战略思维至关重要,决定了党的重大决策方向与目标,指导着党员实践行为的目标与规划。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2019年6月25日)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8]1031}这就是说,要坚持以党的战略思维指导党的建设,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战略定力和战略意志,在党的基本路线、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坚决,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自信和笃定,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视野和格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审时度势、兼顾内外;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大局观和整体观,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抓住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历史机遇,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参考文献:

- [1] 杨春贵.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J]. 理论学刊, 2019, 284(4): 30-39.
- [2] 杨春贵.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3] 法比安·克劳塞维茨传[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41.
- [4] 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87.
- [5]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2020.
- [9] 黄保红. 毛泽东战略思维研究[M].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5,342.
-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逢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511.
-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6] 胡锦涛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18.
- [1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7.
- [18]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86.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0] 刘卫平. 思维创新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M].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13.
- [21]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0.
- [2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3] 杨信礼,屠春友. 现代领导战略思维[M].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45.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ogical Connotations about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UN Xiumin, GAO Weife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s the creativ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serves as the thinking guidance for the Party's basic line and main practice. The cours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how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is good at strategic thinking, and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Party leader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play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the key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China. Xi Jinping strategic thinking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howing the unity of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 melody of the times, and the coura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bravely self-reflect as well as the strategic vision and capac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innovate in the face of new challenges. By summing up and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og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e can provide clear thinking guidance an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goal of the Party's own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so as to cultivate the Party's connotations, strengthen the party's body, and better cope with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unseen in the past 100 years.

Key words: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rategic Think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Logical Connotation